

筷子与汉民族的历史并肩同行

——兼论筷子是汉民族文化的形象代表

吴爱华¹, 徐杰舜²

(1. 武汉学院 人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223; 2. 广西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7)

摘要: 历史是多样性的。汉民族的历史有气壮山河的大手笔、大叙事, 也有涓涓细流的小手笔、小叙事。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在世界历史上气吞山河, 波澜壮阔, 而筷子的起源和演化在世界民族风俗史上也独树一帜, 精巧无比。这一大一, 绝妙地建构了汉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绚丽多彩。泰山、长城、大运河可以作为汉民族文化的象征, 那亿万汉民族及汉文化圈的人们一日三餐都离不开手的筷子就成了汉民族文化的形象代表。

关键词: 筷子; 汉民族; 汉民族文化; 形象代表

【中图分类号】TS9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7X(2019)03-0051-06

DOI:10.13727/j.cnki.53-1191/c.2019.03.009

2015年11月12日, 韩国联合通讯社发布了一篇报道: 2015年11月10日, 中日韩三国专家在韩国青川开展了“筷子国际学术研讨会”, 研讨会举办的目的是为筷子申遗。专家指出, 在中日韩三国的交往联系中, 筷子起着维系三国之间情感、实现合作、和谐共生发展的重要作用。“筷子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举办, 有利于促进筷子申遗成功, 有利于将筷子纳入世界文化遗产行列。会议通过将11月11日定位“筷子节”的决议, 中日韩三国也会为推动申遗工作而持续举办相关事务会议。作为该次学术会议的主办方, 东亚文化城市委员会名誉委员长李耳令(音译)称: 中日韩三国联合起来为筷子申遗, 既是丰富人类文明史的举措, 也是将筷子文化扩大到世界各地的重要方式。^①

这不能不引起了我们对筷子的关注。众所周知, 筷子是汉民族的饮食工具, 它为什么会引起国际关注呢? 拜读了徐华龙先生新近在台湾新北市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大作《箸史》, 顿感如果说泰山、长城、大运河汉民族文化的象征^②, 那么筷子就是汉民族文化的形象代表。^③

筷子这样一个很不起眼的日用食具, 何以能担当汉民族文化的形象代表?

细考筷子的历史, 今人不得不惊讶和感佩的是, 筷子的历史与汉民族的历史有着惊人的重叠。

汉民族的形不成不是一蹴而就的, 徐杰舜在《汉民族发展史》中曾建构了汉民族形成的三部曲, 也就是从夏、商、周等部落联盟的形成与兴起, 再到这些部落联盟形成民族与南方蛮族、北方狄族、西方戎族、东方夷族一起组成了华夏民族, 再到汉代最终完成华夏民族, 整个过程非常漫长, 也体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④。通过这漫长的民族或族群的互动、磨合、整合和融合, 在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滚雪球中, 汉民族族称的确定, 经历了一个曲折的交叉的选择过程, 曾经自称或被称为“秦人”“汉人”“唐人”, 其中“汉人”与“唐人”在不同历史阶段都成为过主流, 而“汉人”一称民族特征更为鲜明。在南北朝时, “汉人”一词才真正赋予“汉族”之义; 元代又将“汉人”专列为第三等级, 于是“汉人”一词作为汉民族的族称,

【作者简介】吴爱华, 武汉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博士, 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

① 国际在线, 新闻 《中日韩专家开会定双11为“筷子节”欲为筷子申遗》, 2015. <http://news.cri.cn/gb/42071/2015/11/12/8131s5163799.htm>

② 徐杰舜在《汉民族发展史》(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2)中曾说“一个民族的文化, 有精神形式的表现, 有物质形式的表现, 山川河流是物质形式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举世闻名的泰山、长城、大运河, 在汉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 有着显著的地位, 起着里程碑的作用, 既是历史的见证, 又是民族文化的象征”。

③ 徐杰舜《汉民族发展史》,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3年版, 第574页。

④ 徐杰舜《汉民族发展史》,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3年版, 第77-215页。

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亦然。近代以后“汉族”族称最后确立。

而筷子的历史亦然。

人类进食的方式不外乎手指、刀叉和筷子三种。筷子为汉民族所使用,正是汉民族文化选择的结果。

最初汉民族的先民是用手抓食的。《路史·前纪》第五卷记载:太古之民,穴居而野处,搏生而咀华,与物相友。“有圣者作楼木而巢,教之巢居以避之,号大巢氏。其为民也,登巢椽蠹,情食鸟兽之肉。若不能饱者,饮其血,嚼其肉。茹其皮毛,未有火化,捆橡栗以为食”。可见,汉民族的先民之一——有巢氏是用手来进食的。及至商周时,用手进食还是汉民族先民的一种进食方法,《礼记·曲礼》云“共食不饱,共饭不泽手”。其意是大家一道进食,不要吃得很饱;共餐时在一个器皿中抓饭,手上不能有汗泽,要事先洗干净。可见,当时手是吃饭的重要食具,故五指中的第二指亦称为“食指”,即指该手指是吃食的关键。古人认为“食指一动”,就是有盛饌的预兆。《左传》宣公四年(前605年)云:楚国献尾于郑国,适遇公子宋与公子家将要入宫见郑国国君灵公,公子宋的食指颤动了一下,他便对公子家说:今日我的食指动,必有好东西吃。进入王宫,果然看见御厨正在剖宰尾。^①故《礼记·士虞礼》郑玄注“古者饭以手。”贾疏“伯黍毋以箸,故知古者用手。”很显然,这里所说的远古时候的人吃饭是不用筷子,而是用手来进食的。^②

用手进食,人们注意到抓食时手应干净,故饭前盥洗手的卫生之礼也就产生。《礼记·丧大记》云“食粥于盛不盥,食于簋者盥。”孔疏“食粥于盛不盥者,以其歠粥不用手,故不盥;食于簋者盥者,谓竹筥饭盛于簋,以手就簋取饭,故盥也。”喝粥不洗手而抓饭洗手,也仍是出于卫生的考虑。甲骨文就有“贞勿……盥,侑于河”^③、“贞翌庚辰小子有濯”^④的记载,盥字作皿中洗手

形,濯谓涤濯,可知商代已有洁手之礼。这种用手进食的方式,夏商时称之为“抓食”。陕西绥德出土一件铜钺,上有飨字,像主人膝隐地,跪而对食,一人正伸手抓取盘中食,就是抓食吃法的示意。^⑤

二

在汉民族形成三部曲的滚雪球中,进食方式也发生了演进,一是刀叉的使用,二是筷子的出现。

商周之时,进食方式已呈多样性,除抓食之外,也开始使用各种餐具进食。在文献中记载的餐具有刀、叉、箸,以及匕、柶、勺、斗、瓚等。

考古发现的夏商时期铜刀、铜削、石刀、玉刀、蚌刀等等甚多,其中有的可能曾作餐刀之用。1980年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区发掘的M2墓中,随葬品中同出两把单面刃铜刀,短柄的一把长18.4厘米,有环首柄的一把长26.2厘米,尖部上挑,^⑥大概曾作切割肉食的餐刀。解放前安阳殷墟小屯发掘的186号墓,出铜刀多件,其中一件置于一张木俎上,^⑦可见是作厨刀用的。

还有叉,餐叉别名“毕”。《仪礼·特牲馈食礼》云“宗人执毕先入”,郑注“毕形如叉。”叉之用,始见于新石器晚期,以甘肃武威娘娘台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餐叉为最早,骨质,扁平形,三齿。^⑧据初步统计,考古发现的餐叉已有64件之多,大部分为骨制,汉代以后又有铜制、铁制者,河南、山西、山东、甘肃、宁夏等地区均有发现,以河南洛阳中州路一座战国早期墓所出51把为最多,一般长度在12厘米以上,20厘米以下,有双齿或三齿之分,齿长四、五厘米;汉画像石描绘的有关“进食图”,也每见餐叉之用。夏代餐叉尚未发现,商代有之。郑州商城曾出骨叉一把,扁平形,三齿,齿长2.5厘米、通长8.7厘米、宽1.7厘米,齿柄间无明显分界,可见是作餐具使用的。但餐叉之用,最盛是在战国时代。

① 《史记·郑世家》也有同样记载。

② 徐华龙《箸史》,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第2-3页。

③ 《乙》8077。

④ 《合集》3266。

⑤ 《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图版八八,图版说明,第13-14页。

⑥ 《1980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3期。

⑦ 石璋如《殷墟墓葬之四:乙区基址下下的墓葬》,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1976年版,第52-68页。

⑧ 《甘肃武威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图版四:6。

从上可见汉民族的先民在夏商时已开始流行进食用刀叉。

除刀叉外,匕、柶、勺、斗、瓚等使用也各有千秋。如匕,是餐匙一类的进食具,前端有浅凹槽和薄刃,有扁条形和瑚体形等,质料有骨制、角制、木制等,后又出现铜、玉制者。《说文》云:“匕,亦所以用比取饭,一名柶。”匕、柶互训,似一物而异名。段注“匕,即今之饭匙也。”可见,匕是公共使用的取饭餐具,^①而勺、斗、瓚三者则主要是用来挹酒舀汤的餐具。^②总之,与刀、叉一起作进食之用具,也表现了汉民族先民餐具的多样性。

商时箸已出现,箸有竹、木、骨、象牙、铜、银制者等等。20世纪30年代殷墟西北冈殷墓发现过铜箸三双,梁思永曾据同出器物推测说“以孟三、壶三,铲三,箸三双之配合,似为三组颇复杂之食具。”^③然而陈梦家指出,这套餐具应该分成两种类型:一类是用木柄握持的匕、铲以及箸,其中匕类似于今日的漏勺,主要用途是在肉汤中捞取肉块。^④陈先生所提到的这种“箸”,类似于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较长的筷子,主要用于挑、拌,如下面条时所用,而不是直接用来进食的小筷。而目前所知最早的小筷,出自安徽贵池徽家冲,为铜制,一双,长20.3厘米,属于春秋晚期^⑤。湖北随县战国前期偏晚的曾侯乙墓,在随葬的一长方形黑漆食具箱内,放有耳杯16个,木勺2把,竹?两双;其?用竹片弯成,一端相连,可能是箸的变形。^⑥目前已知最早的箸是1988和1989年发掘的湖北长阳香炉石遗址第三层出土的东周时期的骨箸。^⑦还有1961年,云南祥云大波那的铜棺墓中出土圆柱形铜条3根,长约20厘米,有人断定为铜筷。经

测验,约是公元前459年的遗物,相当于春秋晚期。^⑧从考古材料上看,箸出现的时间在春秋战国时期。但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而且文献中有殷人用箸进食之说,《韩非子·喻老》中曾经提到过,在商朝时期,纣王曾经使用过用象牙制成的筷子,而纣王的叔叔箕子则认为,用象牙制成的筷子与土陶器搭配,无异于暴殄天物,只有用犀角和玉石做的杯子才能陪衬象牙做的筷子,但这种组合用来盛放、食用豆类与藿菜组成的菜汤,却也显得浪费。此外《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淮南子·说山训》均谓“纣为象箸。”《论衡·龙虚篇》云“传曰:纣作象箸。”《新书·连语》云“纣损天下,自箸而始。”如商末纣王用贵重象牙箸进食属实,则应与进食方式有关。所以宋镇豪先生推测说,商代既有大箸,小箸理应有之,犹勺、斗有大小之分,大者用于挹酒舀汤,小者用为餐具,箸当亦如之。^⑨而且“象箸”的出现,足见箸质已从低级向高级升华,这些记载肯定地表达了在商代我们的祖先已经开始使用箸。^⑩

必须指出的是,汉民族先民很早就学会了使用餐具进食的方式,但用手抓食的古习却长时期沿袭不衰。《礼记·曲礼上》云“饭黍无以(毋从)箸,羹之有菜者用挾,其无菜者不用挾。”汉郑玄注“挾,犹箸也,今人或谓箸为挾提也。”由此推之,饭食或其他干食,古人通常用手抓而食之;刀则用来割碎肉块而食之,箸虽已出现,但尚未成为进食的主要餐具,故《史记·樊哙列传》记“哙既饮酒,拔剑切肉,食尽之”,是其晚例。这又表现了汉民族先民在先秦之时进食方式的多样性。

- ① 其实匕的用途很广,可取饭,可将肉食从容器中取出等,详见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9-272页。
- ② 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2-274页。
- ③ 梁思永《国立中央研究院参加教育部第二次全国展览会出品目录》,见《国内学术界消息(二十五年一月至六月)》转载,《燕京学报》1937年第21期。转引自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5页。
- ④ 陈梦家《殷代铜器》,《考古学报》1954年第7册。
- ⑤ 《安徽贵池发现东周青铜器》,《文物》1980年第8期。
- ⑥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7期。
- ⑦ 湖北省清江隔河岩考古队《湖北清江香炉石遗址的发掘》,《文物》1995年第9期。
- ⑧ 郭伯南等《华夏风物探源》,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65-268页。
- ⑨ 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6页。
- ⑩ 张红燕《筷子——中国文化的典型符号》,《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1年第9期。

三

在与汉民族历史并肩同行中,民族或族群的多元,使“箸”的名称也呈多样性,文献中有箸、櫡、挾、?、挾提、筋等称。那么,箸是怎么脱颖而出,又怎么被称为“筷子”了呢?

自“箸”字被用在五国攻秦时期秦国发布的檄文《诅楚文》中,迄今已有两千余年历史。^①《荀子·解蔽》亦载“从山下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秦汉之时,汉民族形成后,对箸的各种称呼也随着汉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而逐渐认同“箸”了。

汉代既使用“箸”,又使用“櫡”。汉代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纣为象箸,而箕子唏。”《史记·绛侯世家》中,以箸作“櫡”。《史记·留侯世家》载“汉王曰‘何哉?’张良对曰‘臣请借前箸为大王筹之。’”《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载“顷之,景帝居禁中,召条侯,赐食。独置大,无切肉,又不置櫡。条侯心不平,顾谓尚席取櫡”。《汉书·周亚夫传》亦载“独置大,无切肉,又不置箸。”《说文》曰“箸,饭? (qì 音欺)也,从竹者声。”《急就篇》亦曰“箸,谓之挾”。随着箸成为一种为民众所熟知并普遍使用的工具,与之相关的成语也应运而生。如《史记·留侯世家》:“请借前箸以筹之。”形成“借箸代筹”的成语,意指借你前面的筷子来指画当前的形势,后比喻从旁为人出主意,计划事情。

魏晋南北朝时,“箸”常与“匕”“匙”联用。如《三国志·蜀书·先主传第二》载“先主未出时,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先主未发。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魏书·杨播列传》载“播家世纯厚,并食则津亲授匙箸,味皆先尝,桩命食,然后食。”到南北朝刘宋时,箸已十分讲究,宫廷里有了金镂匕箸。所谓金镂匕箸,就是用金子镂刻的匕与箸。为了表彰,皇帝往往会将金箸赐予功臣,以示奖励。如《宋书·沈庆之传》:“居清明门外,有宅太子妃上世祖金镂匕箸

及杆杓,上以赐庆之”。有意思的是在魏晋南北朝时“象箸玉杯”成了亡国亡族的悲剧性的词汇,如《晋书·夏侯湛列传》、《旧五代史·晋书·少帝纪三》中都有这样的记载。无论情况多么复杂,这时箸的使用已普遍流行,用箸表达各种行为方式的,徐华龙在《箸史》中就归纳了投箸、弃箸、罢箸、辍箸、放箸五种与进食有关的情绪表达。^②

汉民族经过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洗礼,以全新的面貌进入隋唐。与此同时,箸的历史也出现了新的风貌,即“箸”已成为主要的进食工具。

箸本来大多是以竹、木制成,但到了隋唐时期开始盛行使用贵金属制成的箸。在考古中,不断地发现隋唐时期的银箸。我国迄今考古发现的最早的银箸,是在隋代长安李静训墓出土的。^③箸的普及使用,突出表现在婚礼上有摆箸的仪式,《新唐书·礼乐志八》载“盥馈。舅、姑入于室,妇盥馈。布席于室之奥,舅、姑共席坐,俱东面南上。赞者设尊于室内北墉下,饌于房内西墉下,如同牢。牲醴皆节折,右载之寸舅俎,左载之于姑俎。妇人,升自西阶,入房,以酱进。其它饌,从者设之,皆加匕箸。俎入,设于豆东。赞者各授箸,舅、姑各以篚菹濡于酱,祭于笾、豆之间,又祭饭讫,乃食。三饭,卒食。”在这里,筷子成为必要的祭祀和吃饭的用具。在唐朝年间,排场铺张奢华的酒宴十分常见,敦煌473窟当中的壁画《宴饮图》就呈现出了当年席丰履厚的场景,女子身边都摆放了宴席主人准备的箸和匙。^④由于箸的流行,唐诗中也少不了反映,李白在《行路难》(其一)当中形容自己仕途遭遇险阻、抱负无从施展时,就是以“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杜甫在反应食肉阶层荒淫无道的丑态时,也曾引用“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高适的《燕歌行》吟“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徐华龙的《箸史》对箸入唐诗从应酬、描述、状态、材质,以及筹箸、象征、筹划和搅棒等方面的详细的描述。^⑤

宋代用箸进食已十分流行,四川保宁(今阆中)就曾经发掘过超过百双的铜质箸,粗细、花

① 刘云,朱碇欧《筷子》,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② 徐华龙《箸史》,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第33-39页。

③ 唐金裕《西安西郊隋李静训墓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9期。

④ 王仁湘《中国古代进食具匕箸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3期。

⑤ 徐华龙《箸史》,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第90-96页。

纹都并不一致,中部有弦纹。^①从宋词中只见箸而几乎不见其他进餐餐具了。如莫将《木兰花(晨景)》曰“晨光渐渐收寒气。昨夜遣箸犹在地”。竹箸,成了最普通的制箸材质之一,是人们喜欢的用餐工具。《太平广记》卷第一百六十五《廉俭(吝嗇附)》有一段关于使用竹箸的珍贵记载“齐明帝尝饮食,捉竹箸,谓卫尉应昭光曰:‘卿解我用竹箸意否?’答曰‘昔夏禹衣恶,往诰流雷(言)。象箸蒙腴,先哲垂诫。今睿情冲素,还风反古。太平之迹,唯竹箸而已。’”这段话大致是这样一个场景:齐明帝在一次用餐的时候,手握竹箸向其侍卫应昭光问道“你知道我使用竹质筷子(而不是其他更华贵材质筷子)的用意吗?”而应昭光则回答道“夏朝的上古圣贤禹帝曾经穿着简朴,并针对因此引起的非议回应道‘使用象牙材质的筷子吃精美奢侈的饮食,是古代先贤曾经对于统治者(不可为之)的告诫’,今天您明智地选择了朴素的生活方式,既合乎古圣先贤的忠告,帝王使用竹筷也是当代太平盛世的标志。”

除竹箸外,宋代制箸材质亦多样,有犀牛箸,如王千秋的两首词《鹧鸪天(蒸茧)》云“丝馅细,粉肌匀。从它犀箸破花纹”;《点绛唇》曰“犀箸调匀,更为双双卷”。有金箸,如曹冠《朝中措(茶)》云“金箸春葱击拂,花瓷雪乳珍奇”。有玉箸,如杨泽民《少年游》云“鸾胎麟角,金盘玉箸,芳果荐香橙。”有朱漆箸,如《宋史·五行志五》云“有龟大如钱,蛇若朱漆箸。”

而重要的是箸作为进餐的餐具,在宋词中有充分的呈现。如吃菜,《苏轼文集》卷十四《诗》七十九首云“溪中乱石墙垣古,山下寒蔬匕箸香。”其意为在荒山野岭里,虽然吃的是普通的菜蔬,却是非常香甜可口的。又如吃蟹,《苏轼文集》卷二十三第六十七首《次韵正辅同游白水山》云“赤鱼白蟹箸屢下”。说的是箸可以用来吃鱼同时也可以吃蟹。再如喝粥,喝粥一般可以不要筷子,但是苏轼有诗《过汤阴市得豌豆大麦粥示三儿子》云:“青班照匕箸”,是指青杂色的映照白色的匕箸,显出一种意境,更有诗意。

在箸的流行中,结婚时,嫁妆里放有箸的风俗早在北宋年间就已经出现,《东京梦华录·娶妇》

当中就曾经提过这种被称为“回鱼筋”的风俗,出嫁女的娘家用两瓶淡水、三五条活鱼以及一双筷子(也就是“筋”),装在圆口酒瓶当中,共同表达了对娘家的眷念与不舍。^②

四

经过元代的血与火,进入明代后,汉民族用箸进食已形成日常文化现象,箸文化的演进有两大突出的变化:

一是明代的箸形成了上方下圆的特徵。从考古材料中看,明代之前筷子大多为圆柱体,也有六棱形,但四方形极少。到了明代,箸基本形成了上方下圆的特徵,意指“天方地圆”。在20世纪70年代四川珙县,考古工作者就曾经在了一口悬棺中发掘出一根单支的红色竹筷,筷子长28公分,筷尾方形、筷尖圆形,在筷杆中段至筷尾的部分镌刻了“江山口高日月口长五子口阿旦休”的十四字草书。^③同时,在河南地区发掘出来一根木质筷子,长31公分,同样也是筷尾方形、筷尖圆形,而在北京的明神宗朱翊钧墓里,1956年发掘出土了两双乌木镶金箸,也是首方足圆,四楞箸顶端镶有方金帽。^④

其实,这个变化是汉民族生活经验的总结。因为圆柱体箸容易滚动,首方足圆箸不会滚动,放在桌上很稳重。四楞方箸还为文人墨客、能工巧匠在箸上题写诗词、篆刻字迹,进行艺术创作提供较好的物质条件。可见明代箸造型的这个变化非常实用,从此成为汉民族箸的基本造型。

二是“筷子”的俗称开始出现。明代陆容所撰《菽园杂记》卷一云“民间俗讳,各处有之,而吴中为甚。如舟行讳‘住’讳‘翻’,以‘箸’为‘快儿’。”船家希望行船时平顺安稳,到达码头后能捷足先登。而“快”大多使用竹子制作,因而在“快”字头上添上“竹”字头,“筷”字就形成了。对此,明代李豫亨在《推篷寐语》中则是另一种说法,他认为船家将“箸”称为“快子”,并不是“箸”与“住”谐音,而是“箸”与“滞”谐音。“世有讳恶字而呼为美字者,如立箸讳滞,呼为快子。”船家取意行舟快如飞,久而久之便喊开了,“快子”按文字学规律,渐渐变成

① 张启明《四川阆中县出土宋代窖藏》,《文物》1984年第7期。

② 徐华龙《箸史》,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第120-125页。

③ 四川省博物馆,洪县文化馆《四川珙县洛表公社十具“夔人”悬棺清理简报》,《文物》1980年第7期。

④ 刘云主编《中国箸文化大观》,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了“筷子”。有人认为,在封建时期被加以蔑称“鬻家”的渔民社会地位不高,其生活习惯被达官贵人所适应乃至广泛在上流社会流传的几率不大。而之所以将古称箸改成了今日的俗称筷子,则是为了避讳明朝皇族朱姓一族的姓氏;其次,在古代宴会当中,猪肉作为非常常见的食材,却在读音上与箸相同,饮宴时不方便分辨;再次,宴会本就应该是一件“快乐”的活动;最后,在宴会当中,“快”字非常常见,催促上菜、劝酒劝菜,都会用到“快”字。正因如此,“筷子”从下里巴人的俗称,逐渐成为了被广泛接受称谓。^①但不管什么原因,筷子一名在明代开始出现是箸文化演化的一大拐点。

及至清代,在汉民族文化的重建和开新中,筷子之称逐渐流行于南北。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中亦云“俗呼箸为快子,陆容《寂园杂记》谓起于吴中,如舟行讳‘住’讳‘翻’,以‘箸’为‘快儿’”。可见,“快子”和“筷子”的俗称与演化,体现出在吴语用词“快儿”在明朝融入了官话后,又在清朝被少数民族统治者的语言习惯所影响。对此,王琪在《从“箸”演变到“筷子”的再探讨》中做了语言学的分析,其云“‘箸’的

发展轨迹应为‘箸’→明代吴方言的‘快儿’→明代官话的‘快儿’→清代共同语的‘快子’→清代共同语的‘筷子’”。有意思的是,陕西一些地方的俚语中,“筷子”虽然已经成为普遍称谓,但用来盛放筷子的竹质笼子,直到今天还被称作“箸笼子”,在某种程度上展现出了古语“箸”的称谓到今天“筷子”的演化轨迹。^②

当然“箸”也像其他古语词一样,虽然在共同语中销声匿迹了,但是依旧活跃在现代一些南北方言中。^③如浙江武义县的武义方言中至今乃称筷子为“箸”,从不称箸为“筷子”。又如在梅县方言中“箸”“筷”并用。据有学者云:在汉语方言中,大多数地方都已经改成了“筷子”的称谓,只有福建部分使用闽南话方言以及广东粤北粤西地区的部分粤语方言中、部分湖北河北方言当中,还将筷子成为“箸”。当然,华北西北平原的部分方言当中还使用者与古语“箸”相关的词语,如箸笼等,只是在今天也逐渐被演化为了“筷笼”或“筷笼子”。“筷子”大有取代“箸”之趋势。^④

从人类学的角度去审视筷子这个传承千年的餐具,完全有理由视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筷子作为汉民族的形象代表是当之无愧的。^⑤

Chopsticks as a mirror of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as a typical cultural image of the Chinese nation

WU Ai-hua¹ & XU Jie-sun²

(1.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College, Wuhan 430223, China;

2.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530007, China)

Abstract: History is diverse. The history of the Han nationality finds expression both in grand events and minor one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Han nationality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is magnificent and impressive, while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chopsticks in the folkloric history of the world is also unique and exquisite, which excellently combine to construct the brilliant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Han nationality. Mount Tai, the Great Wall and the Grand Canal are the cultural symbols of the Han nationality while the chopsticks popular with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the Han people has become a typical cultural image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chopsticks; Han nationality; Han culture; image representation

(责任编辑 万志琼)

① 宁波 《刍议筷子的起源及其民间文化传承的功能》,《文化学刊》2015年第2期。

② 张成材 《从“箸”演变到“筷子”的初步考察》,《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

③ 王琪 《从“箸”演变到“筷子”的再探讨》,《古汉语研究》2008年第1期。

④ 张成材 《从“箸”演变到“筷子”的初步考察》,《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

⑤ 李思辉 《一双筷子与十亿人的文化情感》,《光明日报》2015年11月26日。